



五卅运动片断回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3月



五卅运动片断回忆

上海五卅运动纪念馆编

五卅运动片断回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五卅运动片断回忆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1 1/2 插頁 1 字數 28,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

統一書号：11074·222

定 价：(6) 0.17元

封面設計：任 意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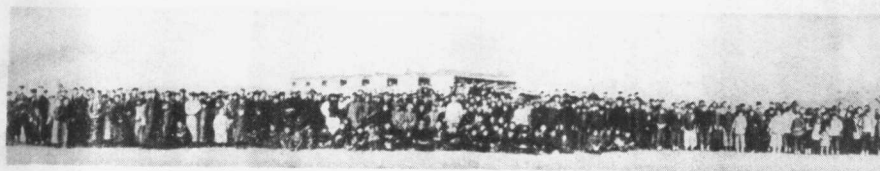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本书的内容，就是亲身参加过“五卅”运动的一部分老工人的回忆。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生活是多么痛苦，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进行反帝斗争又是多么英勇和坚决，同时也说明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些回忆对于我们广大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来说，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不过，“五卅”运动的规模是宏伟的，这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是远不够全面的，只能反映出当时斗争的片断情况。

本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有一部分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本书中的照片，都是上海工人史料委员会供给的。

編者 一九五八年八月



这是“五卅”运动前的上海童工。他们工资特别低，工作时间又长，每年都有不少的人被虐待死去。



罢工工人在潭子湾集合，举行羣衆大会。

这是“五卅”惨案发生后巡捕房附近的景象，地面上是被害人的尸体。





六月三十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
“五卅”死难烈士追悼会，这是
追悼会上的烈士血衣亭。



刘华烈士遗像



顾正红烈士遗像

目 录

回忆“五卅”.....	王正生講 唐振苏記 (1)
敢死队的一天.....	李 子 (6)
电话工人攢听筒.....	江 浜 (12)
——褚士良同志談电话工人罢工经过	
邓中夏与上海海員罢工.....	張錫堂 (16)
刘华烈士二三事.....	徐洛德 (18)
回忆顧正紅烈士.....	韓阿秋 (27)
談判.....	周子海 (33)
附录:	
“五卅”运动(歌謠).....	(42)
“五卅”小調.....	(44)

回 憶 “五 卅”

王正生講 唐振蘇記

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在帝国主义与北洋軍閥相勾結的反动統治下面，上海工人过着非常悲慘的生活。以我們那个紗厂——日本内外棉第五厂（按：現为上海国棉二厂）來說，一天要做工十三个鐘头，早晨上工，只要你迟到一分鐘，就关上大門，不得过去；进去了也要扣工資。星期日做夜工，一般紗厂都在第二天上午六点鐘放工，而日本帝国主义硬要拖到九点鐘，这三个鐘头却不給工錢，只发两个烧餅或者三分錢就算了。吃飯的时候不准关車。女工怀孕后期，也不能停工，必須在生育的前一天才能得到休息，因而常常发生小产現象。童工則更可怜，十几岁的小孩子，要和大人一样地工作，大人一天工資有二、三角，他們只有一角二、三分。

工人在政治上更沒有自由，受尽了野蛮、殘酷的压迫。因工作時間太长，做夜工时难免要打瞌睡。但是只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看見了，就是拳打脚踢；这还算是客气的，弄得不好，还要被罰工一个到三个不等。从这个車間到那个車間去

是不准許的。有一次，我站在車間門口望望，日本工頭拿起簡管就向我的頭上打。我說：“望望有什麼關係？”結果被罰了二個工。晚上，如果有七、八個人在一起，只要被巡捕房頭子看見，就被一陣亂打。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真是氣憤極了，但是有冤無處申。當時的反動政府將工會看成眼中釘，他們說：“你們工人下流，想組織工會造反嗎？槍斃！”但我們心里却在狠狠地回答他：“造反”的日子在後頭呢！

二

一九二四年冬月里，共產黨人李立三、劉華兩位同志來了，他們接近我們，在曹家渡檳榔路成立了工人俱樂部，日本內外棉五、七廠（按：現為上海國棉二廠）、東亞制蓆廠（現為上海蓆紡織廠）、日華三、四廠（現為國棉六廠）的許多工人，都來這裡玩。唱戲呀，下棋呀，打台球呀，……十分熱鬧。在這裡，在黨的領導下，工會會員一天天增多，顧正紅就是其中的一個，每天晚上上文化課，星期三上政治課。

記得有一次的算細賬最打動人心。李立三同志說：“人家一天做工八小時，你們做十三小時；星期日多做三小時，只給兩個燒餅；工資應給大洋，結果發小洋也就算了。你們一個人來算不多，成千成萬的工人加起來，不是被剝削了很多血汗錢嗎？”“你們打瞌睡，就罰工；從這個車間到那個車間，就挨打或者被開除；被機器壓死、壓傷的，也得不到撫卹和醫治。這樣行嗎？……”我們听了，心里都很激動。

黨進一步启发、領導我們向帝國主義作鬥爭：“你們工錢

这样少：一般的一天工錢二角半(最多三角半)，一月七元五角，有的人帶飯，花去四塊錢，還有三塊半够做什么，應該要求日本人加工錢。”工人都問：“要加多少？”“一天加二分都是好的。”大家听了，高兴是高兴，但是，从来就沒有人向日本帝国主义提过什么要求，思想上有顧慮。这时，党給大家撐腰：“我們各个厂的工人，在俱乐部里都是亲亲热热的，有什么事情，應該團結互助。”一听说有人帮助，工人来劲了，先从我們内外棉五厂开始，推派代表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要求。在广大工人压力下，几天之后，每人每天工資加了二分。斗争得到了初步胜利，我們真是欢天喜地。以后，到工人俱乐部来的工人更多了，胆也更大，各厂之間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

党又通过俱乐部布置任务了：“我們这里尽是男工人，沒有一个女的。大家應該动员她們来呀！”内外棉六厂的孙其昌拍着胸脯說：“我有把握到七厂去带动她們。”(七厂大都是女工)記得是一九二五年四月的某一天，他到七厂去和一位姓赵的男工人接头，正在談話的时候，被日本工头看見了，关起大門，抓住他一頓毒打，两人都被开除。

晚上，到俱乐部汇报情况后，大家气愤极了，一致提議要讓他俩恢复工作。第二天，派出几十个代表一齐拥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面前，提出这个要求，当时沒有結果。第三天，繼續开会討論“如果不恢复他們工作怎么办？”大家提出两个办法：罢工；要工錢。

四月十五日早晨，以敲鉄管为号，七厂女工带头罢工了；到九、十点钟，又有五、六、八厂等工人計四、五千人全部罢工。

第二天，俱樂部被巡捕封鎖，我們就在廣場上露天開會。罷了五天工，還沒有答復，我們決定再派代表去談判，去要工錢。但日本資本家却說：“沒有工錢，要做就做，不做拉倒。”態度非常蠻橫。五月十五日，工人顧正紅首先跑到工廠里拿出鐵棍，所有工人都拿出鐵棍、木棍，人山人海地向四、五十個日本鬼子圍攔上去。顧正紅身子高高的，領着幾十個人的先鋒隊衝在最前排。工人羣衆聲勢浩大，包圍圈越來越緊，一個名叫“小大板”的日本鬼子竟掏出手槍，“乒！乒！”地開火了，顧正紅身中數彈，送到醫院後不久就犧牲了。從此，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火花以空前的規模爆炸開來，從曹家渡到楊樹浦，到浦東，到吳淞……，成千上萬的工人都懷着義憤的心情，毅然走出了工廠，走上反帝鬥爭的最前列。

顧正紅犧牲後，我和其他六、七個工人，拿着黨交給我們的一封信，送到聖約翰大學去。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真高呀，一聽到顧正紅被槍殺的消息，都無比憤怒地跳了起來。立即印傳單，寫標語，到處宣傳。到三十日，又有許多工人和學生，在南京路講演顧正紅被殺情形，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當時，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竟逮捕了很多工人、學生，於是羣衆紛紛向南京路老關捕房要求釋放他們。下午三點多鐘，帝國主義的捕房首領竟下令開槍，當時聚集在捕房門首的羣衆將近萬人，頓時血肉橫飛，死傷好幾十個人，這便是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

“五卅”屠殺激起了全市人民無比的憤怒，全市數十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上海，完全浸沉在反帝鬥爭的

狂涛骇浪之中。

上海工人阶级和爱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反帝斗争，这便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的先声。

敢死隊的一天

李 子

“……三十三年前，那是一九二五年，我二十五歲。我們的伙伴顧正紅被日本帝國主義殺害了。這件事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我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罷工了。”

我一走進上海國棉二廠機電工場副工場長王樹森的家，就聽見他和他的兩個小兒子講着“五卅”運動的故事。

“我們內外棉東西五廠和七、八、十二廠的罷工已經快三個月了。我們的生活困難到了極點，挨飢受餓，個個都面黃肌瘦，只剩了一把皮包的骨頭。

“記住，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學生們正在南京路上演講，報告顧正紅犧牲的真相，動員全上海的人民都來支援我們。

“誰知帝國主義者殺人成性，竟派了大批的軍隊，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火，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在機關槍和馬刀之下，許多優秀的青年倒下去了，雨水和鮮血，染紅了馬路……

“我們工人並沒有被嚇倒，戰鬥也沒有停止，在我們工人的心裡，都燃燒着一股強烈的不可遏止的復仇的怒火。

“五月三十一日，潭子灣工會辦事處的大院子里，擠滿了無數的工人弟兄，男女老少，大家都圍着我們的劉華，喊着口

号：‘我們要报仇！’‘打倒帝国主义！’‘工会下命令去打吧！’刘华拿下头上的鴨舌帽，揮了一下，人声頓時平靜下来，他大声地說：‘勇敢的、不怕死的弟兄举起手来，参加敢死队！’他的話一落音，我們大家都一齐举起手，向前挤，要求第一个写上自己的名字。

“我和我們电灯間的郑殿芳、陆阿弟等四个人，編为第一队。刘华把我們拉到一边，對我們說：‘你們这一队的任务不是去打。’我說：‘出来就是拚的，不打干什么！’刘华同志严肃地望着我們，說：‘你們要服从工会的命令，’我們連忙說：‘工会叫我們做什么，我們就做什么！’

“我們这一队的任务，就是到南市公共体育场去拿傳單，然后貼到租界上去，把‘五卅’真相告訴全上海人民，動員他們都来参加我們工人队伍，向帝国主义斗争。

“我們到了指定去的那个弄堂里，我揀出了一个大浆糊桶，郑殿芳他們抱起一大堆傳單，就向爱多亚路（即現在的延安东路）走去。

“刘华指定我們从爱多亚路到外滩，从外滩貼起，一直貼到南京路，然后在十二点鐘赶回办事处。

“我們到了外滩。这时天下着大雨。

“我們站在一个洋行的大門口，商量着：墙壁都被雨水打湿了，傳單貼在那里呢？只有洋行的大門和櫥窗还是干的，我們就在上面刷浆糊貼傳單，一会儿功夫，整个大門和櫥窗都給貼滿了。

“我們到了汇丰銀行門口，看見一对大銅獅子，好象对我

們也怀着敌意。‘怎么样？也貼他一张？’‘好，把它的嘴封起来！’我們望着被封了嘴的獅子，哈哈大笑，就好象把帝国主义打倒了。

“正笑着，忽然身后竄过一队騎兵，騎兵后面，是一大队英国陸軍、海軍陆战队和万国商团的軍隊。他們都弯着腰，向南京路冲去。

“不知是那一个說：‘一定是南京路又打起来了。’我說：‘快，赶上去！’

“雨下得更大了，地上积了两三寸深的水，狹窄的南京路上，挤滿了軍隊。他們匆忙地布置着，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架着四挺机枪，那些外国兵，伏在麻袋堆起的围墙下，两手抓着机枪，好象准备和有着強大装备的队伍打仗一样。

“陆阿弟問：‘怎么办？’我想：我們是敢死队员，我們不怕死！我說：‘不怕他們！貼！’

“我們一直貼到了哈同大楼对面的馬宝山糖果店門口，迎面来了三个外国軍官，一个拿手杖的洋鬼子，好象是外国領事，他們盯着我們望。

“这时，其中一个海軍軍官走到郑殿芳面前，搶去一把傳單，回头就走。郑殿芳把手中的傳單交給陆阿弟他們，赶上去，拉住那个軍官向他要回，郑殿芳还未开口，那軍官伸出手，一反一正打了他两个耳光，我实在忍不住了，奔过去，喊着：‘混蛋，你們凭什么打我們中国人！’海軍軍官后退了一步，另外两个軍官一起举起手枪，对着我們。那个穿西装的外国領事橫过身子，朝我們当中一挡，咕咕地說着什么，我以为他罵

我，就說：‘你敢罵老子！你罵一句，就帶回兩句！’他根本沒听懂我的話，反而皮笑肉不笑地點點頭，帶着三個軍官轉身走了。我們四個人就跟在他們後面，一边走，一邊貼。他們就象是我們的保鏢似的，誰也不來攔我們。

“路邊的外國軍隊，看見他們的軍官手上拿着傳單，也跑上來向我們要。我們就把傳單一張張地分給他們，順手也在機關槍架子的鐵板上貼了幾張。軍隊多的地方，我們就攢過去一疊，傳單少，兵多，他們都爭奪着，不知從那里走出一個懂中文的人，他接過傳單，一邊念，一邊講，那些外國兵都豎起耳朵聽。我輕輕地對鄭殿芳說：‘行，他替我們做宣傳了！’

“到了浙江路，傳單都張貼和散發掉了，任務也完成了。這時，路上擠滿了遊行示威的人。他們拚命地喊口號，那聲音真是震動人心。雨下得更大了，但是大家都沒有注意到。成千成萬的人擁擠着，不再向前。我擠到前面一看，原來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門口布滿了軍隊，路邊停了兩部紅色的大救火車，車上噴出的水就象兩條白色的大蟒蛇，呼啦呼啦地擋住了遊行隊伍的去路。

“我禁不住叫起來：‘老鄭，任務完成了，我們干呀！’聽不見他回話，我掉頭一看，他不在了。再看北邊，只見那四個外國人，拖着他們越過馬路，向軍隊後面跑。我一蹬腳，奔過去，一把拉着那個外國領事，用盡全身的力氣把他向這邊拖。忽然，身邊跳出五個巡捕，把領事向他們那邊拉。我冒火了，鬆開手舉起拳頭就打那些狗巡捕（那個領事逃跑了），我的拳頭還沒有打下來，一條水龍對準我沖，那水就象一條巨大的橡皮